村上春樹小說的密碼

書林擷趣

嚴輝文

同樣是名作者的名人名作，命運有時也是會不一樣的，這簡直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譬如《國境之南　太陽之西》（內地譯《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以下簡稱「國境」），作爲村上春樹的早期小說，似乎就一直活在《挪威的森林》（以下簡稱「挪」）和《發條鳥年代記》（內地譯《奇鳥行狀錄》，以下簡稱「鳥」）的陰影之中。

許多人認爲，「國境」不過是對「挪」的重構。一個寫三十七歲的老男孩對青春時代戀愛故事的回顧，一個寫三十六歲的主人公成了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的成功人士後，忽然邂逅從前的戀人。就連「國境」中的島本，也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挪」中的直子。

至於「國境」與「鳥」的關係，連村上春樹本人也曾坦陳，「國境」不過是從「鳥」身上裁剪下來的邊角餘料。「國境」本身更像是「鳥」的副產品。

然而，如果你就此以爲「國境」不過爾爾，那就大謬不然了。或謂：「國境」何貴？答曰：貴在演繹了「實有其事之夢」。

是的，實有其事之夢，是「國境」的全部精髓。

說實話，初讀「國境」，我對小說中主人翁初君殊爲不滿，對他痴迷不已終身難忘的初戀情人島本，更是怎麼也喜歡不起來。明知道初君有妻室，有一雙可愛的女兒，有捨棄就無法重來的酒吧事業，爲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近他？明知道初君好不容易擺脫了一段少年時代的「國境之南」情結，爲什麼反覆暗示和勾引，提出種種苛刻得簡直像是無理的需求，竭力創造婚外戀的場景和條件？難道他倆眞的是「災星下出生的戀人」？

成年後的島本，腿疾已愈，渾身名牌，容貌姣好，性感迷人，作爲異性來觀察，本來是應該更可愛的。但是這一次村上的小說中，初君已不是那種跟女人總是進不入了狀況的孑然一身的老男孩。村上甚至於在小說中讓主人翁破例涉足了家庭——初君有一個必須對其負責永遠不能捨棄的家庭，有賢慧的妻子，一雙完美的女兒。這個時候的島本，就是一個不應該出現的存在物。或者換言之，這個時候的島本，愈完美，便愈殘酷。她越是讓初君深陷其中，就越是將其十二歲時的美好形象，十二歲時與初君握手的初始憶戀，破壞殆盡。

然而島本果然是眞實的存在麼？小說中煞有介事地描寫了初君與島本在東京街頭神奇邂逅的過程，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初君與島本從重逢到互訴衷腸，從情感上的難捨難分到肉體上過把癮就死式的瘋狂出軌，如此栩栩如生，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島本的眞實性。

但是島本始終是神秘的，甚至於始終像是虛無縹緲的怪異精靈。一方面，她作爲一個美到不可方物的尤物，一度儼然回到了初君的身邊；另一方面，其十二歲以後的歷史幾乎是一片空白。島本住在哪？靠什麼維持生計？似乎永遠也花不完的錢是哪來的？結婚沒有？早夭的孩子又是誰的？二十多年是如何過來的？哪怕對她自認爲是唯一朋友的初君，也始終不吐一字。即便是需要描述兩人之間的非關鍵問題，也大多使用「大概」、「一段時間」之類的模糊用語。

最後，島本終於在與初君完成欲死欲仙的愛情故事後，消失在了海市蜃樓般的「國境之南」，而初君仍然回到了他的妻子女兒身邊，回到了他的酒吧中，回到了他的寶馬車上，回到了按照資本主義邏輯構築的逐利不息的東京大都市。一句話，初君回到了現實世界，而島本，則跟她曾經送給初君的《國境之南》唱片一道，迅速消失得像從未出現過一樣。鳥本之謎產生於虛無，回歸於虛無，像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隨着島本的消失，連同讀者對島本曾經生出的憎恨之情，也不見蹤影。

島本是個什麼人物？現代的村上顯然不能去學中國傳統小說，無法落入將她進行或狐或仙式處理的窠臼，但是村上自有村上的高妙之處，他認爲那就是一個實有其事之夢。事實上，村上早就在文中透露了玄機。二十八歲那年，當初君在街頭意外邂逅島本跟蹤未果，並百思不得其解之後，村上筆下的主人翁說：「怎麼想都是難解之謎。有時我甚至懷疑那一事件統統是自己幻覺的產物，是自己頭腦中捏造出來的，或者是做了一個活龍活現的長夢，而夢披上了現實的外衣緊緊貼在我的腦際。」

是的，一切皆是實有其事之夢。這不僅是島本之類人物的命運，簡直也是村上小說的精髓所在。村上小說的全部奧秘或許就在於，他慣於通過「實有其事之夢」去擺平現實世界與他心靈中非現實世界的矛盾。依筆者拙見，所有的小說都是現實主義的，或者永遠是需要現實主義打底的。但好的小說，不是現實的照像，不是庸常人物的流水帳，越是眞正的小說家，越要有協調現實與非現實矛盾的手段。村上抱持「我們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的哲學信仰，而始終不甘心於這種有限性，就只能用小說去拓展超現實的無限性。於是必須有謎一般的暗喻，必須使用夢境般的意像，必須用夢幻構築現實。

「國境」道出了村上小說的全部密碼：作家所有的痛苦和衝突，最終只能通過「實有其事之夢」來化解。

做學問須下大功夫

顧　農

如是我見

清代學術史上有一個以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劉寶楠等大師爲代表的「揚州學派」，研究經史和語言文字（按傳統的觀念，小學包括在經學之下），方法精良，成果很多，影響巨大，是乾（隆）嘉（慶）學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一向得到很高的評價。

興化（該縣當年在揚州府轄下）籍大學者李詳（字審言，一八五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論揚州學派》一文中歷舉揚州學派的主要人物，簡要地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寫得最早而很得要領。

該文最後寫道：「光緒以來，唯儀徵劉氏，尙守先人矩矱，其餘五縣兩州，未有能奮自樹立，毅然以前輩爲師者，蓋鶩於功令文字，冀其速化。爲書院院長者，率多巧宦隳官，據爲窟穴，本無學術，不知提倡，謬種流傳，遞扇無已。祿利之途廣，苟簡之習成，凌夷衰微，遂有今日不絕如線之勢。」

又說：「余雖生顧（九苞，字文子，一七三八年至一七八一年）、任（大椿，字子田，一七三八年至一七八九年）之後，少壯習爲辭章，四十以後，略知涉獵，而不能爲專門之業……竊念經史一途，陳陳相因，至難再鑿戶牖，唯子部雜家，其類至廣，性與之近，姑以寄吾好焉。而追念揚州學派，昔爲人所頌者，今且一蹶不振，前賢可傷，後者難繼，餘綜其始末陳之，未嘗不爲之長太息也。」

李詳這裏說的儀徵劉氏，指的是從劉文淇、劉毓松、劉壽曾到劉師培這樣一個經學世家，幾代人沉潛於經學，尤以深入研究《左傳》爲學界所欽仰。可惜像這樣的世家太少了。

在李詳看來，到清末民初，揚州學派已經式微，當下流行的風氣是一味「苟簡」和「速化」，沒有創新，浮躁不寧，很難做什麼眞學問。書院院長（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校長）官僚習氣很深，所謂學者則大抵一身小家子氣，抵擋不住功名利祿的誘惑。總之離開乾嘉學派諸大師的良好學風甚遠甚遠。這話現在聽上去仍然驚心動魄。「祿利之途廣，苟簡之習成」，古已有之，於今爲烈。長此以往，學術事業眞是岌岌乎殆哉。

按李詳的意思，要繼承揚州學派的傳統，就不能急功近利，而應當有廣闊的心胸、崇高的目標，定下神來好好做，慢慢做，長期做。學術研究要有一種大氣，決不能一味追求速度和數量。幸運兒買彩票或有可能一夜暴富，做學問絕無此等驚艷奇聞。

先前揚州學派的大師們十分重視經學和小學，各有專門，如高郵王氏父子研究文字音韻訓詁，寶應劉氏註釋《論語》，儀徵劉氏從事《左傳》。同時他們又很能放得開，例如汪中關注諸子，焦循於致力《周易》、《孟子》之外還研究數學、天文、醫學和戲曲；晚近以來最能維持宗風不墜的劉師培除了專經以外，又精研中古文學，他那本《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曾經得到魯迅的高度評價，至今也還是研究文學史、批評史者案頭常備之書。

看來當年揚州學派的人們不僅境界高、氣魄大，還很講究「通」，決不拘於一隅。在一個過於狹小的地盤裏討生活是很憋氣的，通儒大大高於專家。李詳本人花很大力氣研究「子部雜家」，研究《文選》，表面看去其工作對象同乾嘉以還揚州學派諸大師頗有異同，具體方法也不無變化，而其實正是繼承了此派實事求是、謝絕空談的優良傳統；他能夠與時俱進，所以多有建樹。做學問完全跟着古人走，亦步亦趨，是不行的，這同繪畫一樣，「似我者死」。

我輩後學，自應繼承揚州學派先賢的優秀傳統，並發揚光大之。要做到與時俱進、後出轉精，談何容易，眞所謂任重而道遠，非下一番大功夫不可。

要看「小」自己

朱國良

人生在線

做人幹事，要不迷失方向，總需有個合理可行的坐標。行爲處世，要不左右搖擺，就得把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才能以平和的心態看人看己，以清醒的頭腦對人對事。世界第二大軟體公司CA公司的領頭人，是這樣闡述他們的經營理念的：「CA實際上是一家大公司，但在我們思維中卻是一家小公司。沒有什麼了不得。」看「小」自己，不覺得自己了不起，是爲了做更了不起的事業，是爲了增「大」自己。相反，一事當前，先看「大」自己，必然導致盲目樂觀，狂妄自大。而傲慢之時，就是危險之時。

分量重的大手筆作品，往往是由分量很輕的小手腕舞動小狼毫描繪而成。看小自己，低調做人，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以謙虛的態度做人行事，這是成功人生的先決條件。人的品行也好，人格也罷，重量應該由別人來掂量，那才有意義。自視過高、趾高氣揚、霸氣十足的人在別人看來，往往如風中蘆葦，似田中稗草。

「天使飛得高，是因爲她把自己看得輕小」。這種輕小，不是輕飄飄，而是減輕了負重，放下了包袱。常說看人長處，可以相處，這也正是基於看小自己一點的，在這種心態中，會深切地感受別人的能量、團隊的力量。而總是覺得自己頗有分量，常常感到事事「沒有我不行」的人，其實在氣度和修養上是很小的。我常與人調侃，地球上少了一個人並不會不轉，反而因爲減輕了一個人的分量轉得更快。

重與輕，既充滿矛盾又辯證統一。山尖之大，代表了一種高度；針尖之小，體現了一種力度。哲人畢希納說，人就是「灰塵、沙粒和泥土」。人本身就是很微小的東西，如果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想上天，總把本人比白玉，老將自己當珍珠，怕是時常會有要被埋沒的痛苦。看小自己，是人生和事業的起點，更是一種永恆的精神磨煉。掘到第一桶金的人，往往情緒膨脹，「氣壯如牛」，有人還有「暴發戶」的嘴臉，趾高氣揚的味道。但當成了眞正的富翁之時，往往就會「身輕如燕」，謙和起來。

看小自己，看輕自己，是拋棄城府深沉的一種昇華，是開掘靈魂深度的一種顯示，是一種簡單的行爲方式。世界是複雜的，簡單的東西才是最美的。世界複雜，人如果再不簡單，就會增添更多的糾葛和煩惱，人不看輕自己，痛苦就會接踵而來。看小自己，當然是要有分寸的，自知地過了頭，變成了自卑也不好。這種「看輕」不是喪失自信心，缺乏進取心。而是不張揚，不張狂，是從一滴水的姿態，融於大海中來看待；是以一塊石的位置，對比崇山峻嶺來思考。而對每一個人來說，在平凡之中時時看「小」自己是不易的，在取得成績、「形勢大好」時尤其困難。這時，能自信而不盲目樂觀，能進取而又腳踏實地，能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找到差距和不足，這樣看「輕」和小視自己，才更見精神和境界。這樣的結果，才能促使自己擺正位置，端正姿態，不斷進取，常進一步。

海納百川記澳門

葉　周

往事鈎沉

我第一次踏足澳門，是從美國「海歸」，雄心勃勃地參與一個完全從無到有的電視傳媒項目啓動。在外漂泊十多年，回到亞洲，在澳門噴水池老街上端起瀰漫着澳葡風味的美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氛圍吸引着我。澳門除了賭業爲衆所周知，更有多位中外名人在人生旅途處於低谷時，來此韜光養晦，並在這塊蓮花寶地上結出了精神的碩果。我也是一個漂泊者，到了澳門自然會去尋訪那些在歷史的歲月裏同樣「從海上來的」前行者。

首先要說的是，鄭觀應在澳門撰《盛世危言》。

在澳門西南部下環區龍頭左巷十二號，有一幢白牆黑瓦的二層中式建築，名之爲鄭家大屋，那裏曾經是中國的思想家和實業家鄭觀應的住處。鄭家大屋原是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所建。名爲大屋，名副其實，由十來棟建築連成一片頗爲壯觀的民居群。它後倚西望洋山，高牆外參天榕樹成蔭，西北面向海灣，遠眺灣仔銀坑一帶，風景怡人。

鄭觀應先生有兩首七絕《題澳門新居》寫盡對祖居的深情：

「群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裏一相逢。」

「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儂家正住蓮花地，倒瀉波光接斗牛。」

鄭觀應，這位享年八十一歲的老人，出生在中山，辭世於上海，可是他卻與澳門有着緊密的聯繫。瀏覽一下鄭觀應的年譜，他十五歲去南洋，在一次科舉失利後，受到故鄉親朋習尙經商的影響，選擇了「赴滬學賈」的道路，十七歲去上海，然後在那裏學習、就業，一直到自己經營商務。在豐富的近代工商業的實踐中，他逐漸形成了把中國置於富強之列的完整的思想體系，成爲一代名家。

上海是一個政商雲集的江海通津，在那裏他結識了政商界名流，積極投身於我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說起上海對他的影響，他寫道：「長而客遊四方，日與異國人相接。而滬上爲江海通津，南北冠蓋往來，群萃旅處，達人傑士往往獲從之遊，與之周旋晉接，竊聞時論，多關大計。」他於一八七三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其後先後被李鴻章委任爲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被張之洞委任爲漢陽鐵廠總辦等職，他是洋務運動中的當之無愧的中堅力量。

儘管對於澳門來說，鄭觀應更多的像一個漂泊的游子，但是在他的文稿中卻記錄着他對這個遙遠的海島的關注。時年他三十二歲，正與唐廷樞、盛宣懷等人在上海籌辦「輪船公司」。百忙之中卻在他的《救時揭要》中表達了對澳門的關心。

在他的文章中詳細記錄了不法洋人在澳門販賣豬仔，蹂躪華人的骯髒勾當、殘暴行徑。因爲利潤可觀，澳門的人販子不遺餘力，用盡各種坑蒙拐騙的手段。甚至親族間也會下手。最令人髮指的是，有的歹徒於深夜藏匿於街巷和碼頭，見行人路過，用布袋罩住頭，強拉而去。每天這樣的被害者高達數百人。可是當時的葡萄牙統治者卻置若罔聞，不予嚴懲，使得人人自危。

針對澳門社會的亂象，鄭觀應具體提出了自己的治世建言：「僕雖一介迂生，無力救援，而情形目擊，坐視何安？爰將澳門情事，續伸鄙論，以質高明。安得有萬家生佛，作登高之呼，起千萬蚩蚩之民，而出諸水火乎。」他提出，澳門雖然是西人管轄的地方，也應當設法禁止上述殘害百姓的行徑。

鄭觀應五十一歲時《盛事危言》在廣州出版　（作者供圖）

如果洋人繼續不加強管束，應「嚴立海禁於澳門：四面設立寨柵，不使一人一船涉足其地」，「設一海關以稽查彈壓，則販人出洋者亦不能逞其志也」。身處繁華之都上海，他卻時時爲父老鄉親們居住的澳門呼喊，此情此境令人難忘。

他比較頻繁地回到澳門，應該是四十歲以後的事了。四十四歲時他「脫累歸里，杜門養疴」。所謂的「脫累」，是指他在香港與太古洋行的糾紛，那次他惹了官非，被拘留在香港。五十歲之後因爲父親病逝，親戚去世，或者度歲、養病，鄭觀應常回澳門。那時候從上海到澳門兩地的交通也不方便，海上往來，頗費時日。可是年紀越大，他回來得越頻繁。可是他的這次「杜門養疴」，卻爲後世留下了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

鄭觀應在澳門的居所近有南灣湖，遠有海浪滔滔的水域，與浦江上的繁忙儘管不可相提並論，卻爲他帶來了沉澱思索的空間。可以想見已過不惑之年的鄭觀應，在大屋中閒庭信步，揮毫撰著，眼見的多少近現代的時代風雨在他眼前沉澱下來，他透過歷史的迷霧看清了中國的問題，揣摩着中國的方向。他在書中提到「欲攘外，亟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將在香港和上海等地的豐富經歷凝聚提煉，誕生了屬於他的最獨特的時代的聲音。他的著作《盛世危言》眞切表達出處於亂世之中領航人的奮世疾呼。

也許是命運由此讓他避過一劫，就在《盛世危言》出版的那一年，鄭觀應曾經擔任總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李鴻章傾十四年心血一手創辦的中國最早的棉紡廠在一場大火中付諸一炬。那一年正是上海開埠五十年。而暫時離開上海的鄭觀應卻在澳門的寧靜中完成了一部影響中國未來的巨著。鄭觀應五十一歲時《盛事危言》在廣州出版，書刊出後即獲光緒御覽並推薦，於是洛陽紙貴，得以一紙風行。這部書對許多日後決定中國命運的人物，包括康有爲、梁啓超、光緒帝、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有巨大影響。　（上）

鄭觀應故居鄭家大屋　（作者供圖）

花開者謝　物故者新

嚴　陽

自由談

我居住的這個小城最有名的古建築無疑是水繪園——它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的別墅。據說昔日造園時，將護城河水引入園中，在園中精心構築了逸園、梅塘、湘中閣、洗缽池、玉帶橋、寒碧堂、小三吾亭、小浯溪等十餘處佳境，因而使之成爲一處饒有書卷氣的「文人園」。清初名士陳維崧在《水繪園記》中有這樣的文字：「繪者，會也，南北東西皆水繪其中，林巒葩卉坱圠掩映，若繪畫然。」

但是，今天你看到的水繪園與昔日的水繪園差不多是兩回事。根據冒襄「獻歲八十，十年來火焚刃接，慘極古今！墓田丙舍，豪豪盡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團聚。兩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馬之養；乃鬻宅移居，陋巷獨處，仍手不釋卷，笑傲自娛。每夜燈下寫蠅頭小楷數千，朝易米酒」的自述，我們可以了解到這樣一些基本事實：在那亂世之中，冒襄的生活極爲艱難，以致一度曾經居住在墓地所建的屋舍之中，一家四代人無法團聚，而他的兩個兒子也無法爲他提供物質幫助。在這樣的背景下，他不得不將原來的住房出售而移居於陋巷，靠賣字爲生。水繪園也因此數易其主，數度變化。

冒襄的生活狀態的劇變和水繪園的變遷，不過是這世界「滄海桑田」的縮影。對於此類的變化的根本原因在哪裏，秦朝滅亡後被廢的東陵侯——負責皇陵監管的召平曾經拜訪戰國時楚國的大夫，漢初淪爲長安街頭算命爲生的司馬季主，請他爲自己占一卦。

在聽了東陵侯「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嘘。吾聞之蓄極則泄，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與「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的感慨之後，司馬季主表示：「你已經明白了，爲什麼還要占卦呢？」東陵侯的回答是：「我尙未能夠深入理解其中的高深微妙，希望先生能指點究竟。」

因此，司馬季主講了下面一番話：「你爲什麼不想一下過去呢？有過去就必然有今天。所以，現在的碎瓦壞牆，就是過去的歌樓舞館；現在的荒棘斷梗，就是過去的瓊花玉樹；現在在風露中哀鳴的蟋蟀和蟬，就是過去的鳳笙龍笛；現在的鬼火熒光，就是過去的金燈華燭；現在秋天的苦菜、春天的薺菜，就是過去的象脂駝峰；現在紅的楓葉、白的荻草，就是過去的蜀產美錦、齊製細絹。過去沒有的現在有了，不算過分；過去有過的現在沒有了，也不能算不足。所以從白晝到黑夜，盛開的花朵凋謝了；從秋天到春天，凋萎的植物又發出新芽。激流旋湍下面，必定有深潭；高峻的山丘下面，必定有深谷。」（劉基《司馬季主論卜》）

對於司馬季主來說，這樣的認識應該基於他自身的人生經歷和深刻的人生思考：想當年，他與東陵侯一樣，不也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人上人」？曾幾何時，榮華富貴成爲過去，在經歷「世紀大動盪」之後，他竟然成爲長安街頭的算命先生了！這哪裏是他昔日所曾想到的？沒有想到，但卻成爲了現實；也不僅成爲了現實，而且他的面前出現了又一位與他個人遭遇極其相似的「苦命人」——召平。因此，他的感慨一定是很深的。而在這樣的人生經歷之後，他的思想也變得深沉與深刻了：他終於發現，冥冥之中，其實是有樣東西在主宰着一切，那就是「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的自然規律。

世界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這一規律並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花」與「物」固然是這樣，人類社會同樣如此。譬如說秦始皇在建立統一而強大的帝國——秦朝的時候，他想的是自己是始皇帝，自己身後，則一世二世三世而萬世；然而，誰想到在他去世之後不過寥寥數年，秦朝就土崩瓦解、灰飛煙滅了呢？也不僅是秦始皇帝，中國二十四朝，哪一朝的皇帝開國之初不是信心滿滿，以爲可以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而結果又是如何，我們今天已經看到了。對於這一現象，你可以說是「造化弄人」，歸結於「命運」；但是，說到底這其實是一種「新陳代謝」，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然規律。而既然是規律，那麼，誰都無法抗拒。